

治理污染要有长期性和坚韧性

诸大建

新民时论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城市的雾霾成为上上下下热点话题。因为搞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研究,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污染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解决问题要多少时间。从最近刚刚结束的两会报告以及领导人的态度,大家可以相信政府已经看到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有用强大的体制力量处理问题的决心。作为学者,这里我只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治要有长期性和坚韧性,做一些简单的理性分析。

判断环境压力的大小和发展趋势,可以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污染治理三个变

量进行分析。其中,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与技术进步与污染治理反相关。稍微深一些地说,环境压力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变化,减掉技术进步的变化,再减掉污染治理的变化。如果结果是正的,环境压力就是在加大;结果是负的,环境压力就是在减少;如果是零,环境压力就是处在拐点上。由此可以看到环境压力的来源和原因,更有效地去应对中国的环境问题。

首先是污染治理。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要是指生产和消费等经济过程没有重大转变,在经济末端的

排放口对污染进行治理,环保局的功能主要是在这里。但是污染治理经常碰到“3个80%”的问题,即:污染治理最多只能针对80%的目标对象,例如我国主要污染物控制是COD、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个方面,而不是全要素控制;投入的人财物最多只有80%用到应该用的地方去;治理再好也只有80%的效果。结果3个80%下来,总的结果只是50%。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年来我们的污染治理投入不少,但是污染物处理率常常只有50%上下。末端治理要有效,亟待管理能力的提高。

其次看技术改进。技术改进是在经济发展源头做工作,例如选择环境友好的物质材料,提高生产和消费的资源生产率等,具有清洁发展或绿色发展的意义。我们的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更多因为源头发展模式是浅绿色和非绿色的。高物耗高能耗的工业生产、土地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拼脸面拼身价的消费主义,均是源头非绿色的表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环境老账没有还清,新的经济增长又增加了污染新账。

最后看经济增长。污染问题得到根治的重要标志是

污染排放量从正增长到零增长到负增长,出现了某种稳定的天花板。要达到这一点,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与技术改进速度的匹配,在技术进步速度为一定的情况下(中国通常年改进在4%-5%左右),如果经济增长在7%以上,就意味着至少2%污染排放要通过末端治理来解决。因此,更稳定的环境状况,取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在中国这最应该是2030年左右的事情。在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求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希望有很好的环境状况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

以上看法并不是环境问题的悲观主义,其实是告诉了我们有效改善环境问题的路径和科学步骤,即首先要环保专业部门严格末端治理,努力把污染排放量降低;同时要各路发展部门在源头进行技术变革,使生产、消费和城市绿色化起来,减少污染产生;最后在物质基本需求达到满足,经济规模和增速与技术进步、污染治理能力达到平衡之后,就可以实现环境压力的根本性转变和我们所希望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不准辩论

任大刚

结舌者言

全国两会之前的地方两会期间,广东东莞市政协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环节,其中的工商联界委员小组本来是16个分组中“含金量”最高的,许多委员都是“富豪榜”上数得着的人物,但这个“豪华阵容”没有掀起讨论热潮,整个会场不时陷入无人发言的尴尬。

这种现象当属个别,但是却很契合中国传统的为政、为文风格。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相比,中国古代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都比较缺乏辩论的传统,相互诘难的风气始终不浓。不可否认,先秦时期的确有“百家争鸣”,但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也就是说我本不是喜欢辩论的人,与人辩论实在是不得已。这一时期,喜欢辩论的人,一般也都没有什么好名声,被人敌视。这导致后世很多公共发言异口同声,难于听到不同意见;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比较罕见,导致学术的长进比较缓慢。长此以往,对国家对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里辩论风气不浓的原因很多,但是标志性人物从一开始的公开反对,至少是其中之一,比如韩非子就是如此。

韩非子反对辩论,与其结舌的生理缺陷是否有关不得而知。但是通过他讲的一些故事,可以看出他对辩论的极度排斥,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儿说是个宋国善于辩论的学者,也是持“白马非马”论的人,他通过这一命题说服了很多辩论家。有一次他骑着白马过关隘时,被要求缴纳马税,儿说摆出“白马非马”的理论,意图避税,结果没有成功。

从逻辑上讲,“白马非马”的命题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马税该不该征到一匹具体的白马身上也并非无稽之谈。但

是韩非子对此事的看法很明确:凭借虚妄的言辞,他可以战胜一个国家;考察实际情形,他就一个人也欺瞒不了。一个很有争论价值的逻辑命题被冠以骗子之言的道德(尽管法家眼里没有道德一说)判断,直接判了学术争论的死刑。

对辩论家的厌恶,还体现在荆棘雕猴的故事中。话说宋国有个人请求给燕王在荆棘尖上雕刻猕猴,但要求燕王在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答应了并给了他优厚的俸禄。

掌管冶炼的官员对燕王说,这个人知道大王的斋戒期不过十天,却定了三个月斋戒的期限,实在是想大王永远看不成。再说,凡是被雕刻的,用来雕刻它的工具一定更小一些。我是个搞冶炼的,也没有办法给他制作刻刀。那猕猴不可能有,大王一定要明察。

燕王于是把那个宋人拘禁起来加以盘问,发现他果然在弄虚作假,便杀了他。铁匠对燕王说:“这些诡计很难辨别。言谈之士的话多半跟荆棘雕猕猴一样,是骗子的胡言乱语。”

其实韩非子本人为了言谈辩论,自己倒准备了无数小故事。他可能觉得话说得过于绝对,做了些让步,认为现在君主听取各种言论,不是用确定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论;不是用效果去检验,而是赞赏他们言谈,却不问言谈是否合乎准则。这是君主长期受骗,而辩论家长期被供奉的原因。换言之,韩非子不认为言论应该自由,而应该有标准;此外言论要马上可以检验,不能检验的言论一定是欺瞒。

考虑到汉以后实际形成的“外儒内法”传统,韩非子的这种不准辩论的思想影响不可低估。不可否认,日常生活中很多辩论显得无聊,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期,有意义的辩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稀缺了。

以人为本 求精致

朱绩崧

北窗絮语

坐地铁去城南某家医院看“飞蚊症”,换乘时要走下两段台阶。以前也来过,但这次有处醒目的不同:高处贴出了一张告示,“上下台阶,请勿看手机”,黄底黑字,只要不看手机,便不会漏过。但看看身边上下台阶的换乘客,看手机的依然固我,丝毫没有理会头顶上的友情提示。

很显然,想出高挂告示的这位仁兄,用心固然不错,可惜他没有站在乘客的角度思考问题:既然盯着手机,又岂能看到警告?而边行路边看手机的乘客却恰恰是他此举唯一要服务的对象。

出得地铁,来到医院,门诊换到了附近新建的大楼。新楼自是漂漂亮亮,可一步踏进,呼吸顿时不畅。是不是装修味道重啊?我是易过敏的体质,可眼前的医护人员也个个蹙着眉头,不敢喘大气。我问护士:“气味这么浓,你们找人测过吗?甲醛什么的会不会超标?”护士答:“领导不让测。”我又问:“那空气净化器呢?开起来呀。”护士答:“领导不许开。”我再问:“为什么?”护士解释:“领导讲了,如果阿拉都怀疑装修气味有害健康,那叫病人怎么还敢来看病?”好吧,我谨慎地呼吸了几下,决定不挂号,回家去——我怕挂完眼科还要加挂个肺科。

很显然,不让测甲醛和不许开空气净化器的领导,意在彰显“我们的新大楼不是赶出来的,我们的建筑材料质量是可靠的”,可惜他没有站在病患和医护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楼不光是给他们看的,

更是要他们长期待在里面治疗与接受治疗的。讽刺的是,我离开挂号大厅前,注意到四个斗大的字,“以人为本”。

我们习惯了“以人为本”这句口号很多年,但在公共空间里落实起来,仍不乏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甚至会把“以人为本”也当成一场“以事为本”的秀来做,只需表现出“事”办成了,全不顾及活生生的“人”感受如何。

联想到在许多外省、外国的朋友眼中,上海的魅力尽在于精致,我便觉得这份“精致”中,“小巧”、“嗲”、“糯嗒嗒”等等都是浮沫,沉底的干货唯有一份: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而且是要贯彻到公众生活之每时每刻每个角落的。可惜,大概是这些年发展节奏越来越快,此起彼伏的粗糙就这么得过且过了。

要改并不难。以地铁为例,何不考虑将视觉警告换成听觉提示,在楼梯附近循环播放?如此,则信息传递的效率会高得多。再说医院,若多数人都对异味感觉不适,新大楼投入使用何妨推迟几周?即便真是大家疑心病重,对健康、环保有强迫症般的过度在意,那请第三方机构来当场测评,持续监控,用不会撒谎的数据打消公众的疑虑,岂不比两个“不许”硬气许多?

相比之下,空喊口号,漠视实效,沉溺于形式主义,这一切的背后还是阿权唯上的官僚心态,凡事但求上级满意,其他无所顾忌,恰恰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纵容这种心态在各项政策具体执行的层面上蔓延开去,上海将难以维持其“精致”的传统,这实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地铁安检的空转悬揣

姜泓冰

拾字街头

今年两会期间,在北京留了一段日子,忽然发现,北京地铁车站乘客箱包安检的执行情况,远远好过上海。地铁入口前的通道普遍设置得较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安检人员劝导或拦阻时的语气和手势动作远比上海的同行们更强势更坚决,大多数乘客也都能自觉而顺从地把随身的背包拎袋放到安检设备上,再在另一端耐心地等待着领取——俨然已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行为习惯。

同样的环节,在上海多数地铁站口,大多数人都是完全无视安检人员的存在和指引,听而不闻他们一遍遍重复的要求,昂昂然施施然地走过去。不肯安检的比例太高,安检操作者们声气逐渐走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区分对待——只盯牢那些拎着重箱大袋或不同寻常物品的乘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猜想,根源主要是在群体文化,而不是安检部门执行力有什么高下。上海要严格安检,直接触发的是许多乘客对于安检人员有执法权、能否强制别人接受检查以及安检传输带人人放行、有多不卫生的讨论,以及关于普遍安检之后,每个人进站要多花多少时间,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会形成多大流量拥堵的精准计算。在这样的法治精神和精确计算之后,除了耐心劝导之外,地铁安检的实施大约也只能是眼开眼闭、没人敢于太较真了。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一旦养成,便会互相牵扯,越来越向低处

看齐。作为中国人口最多、还在持续增长的超大城市,上海的地铁安全已是公共安全专家和城市管理者们心底最担忧最不安的所在。地铁安检体系的空转和漏洞,也是引发巨大公共风险的重要一环,它与这个城市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

懂得并且善于维护个人权益,是上海市民文化中一个值得褒扬的显著特征。与它相伴生的,应该是这座城市文化中最令人称许的另一面,即强烈的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所有个人的精明计算、自我权益维护,都因此才不会逾越底线,为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建设留下足够的涵养空间。是在哪里,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失去这样的城市文化底蕴?

同样也是在全国两会上,有幸见到了上海代表委员们捧着政府工作报告和厚厚几大册财政预算表抵字眼、细算账的场面,尤其是女代表樊芸,衣着打扮挺靓丽,说话喉咙并不响亮,但那样内行精确的算账本事和不依不饶的认真劲头,每年都能让政府相关人员冒出一脑门子汗来。看到她时,每每总会想到,未来的中国,若能多一些这样的上海人,多出十位、百位这样精明会算、专业内行又认真当家的代表,少些只会“学习”“汇报”和拍手的代表,多好。

精明不高明,规板少创意,曾有些人打给上海的刻板标签。一座气质文化与众不同的城市,如今渐渐被压上担子,承担起国家使命,如何扬长避短、破旧立新,保住优秀的基因,胸有大格局,真是十分重要。